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学校图书收藏及其特点

——以四篇藏书目录为中心

马玉蕻

(西北师范大学 丝绸之路杂志社,兰州 730070)

提 要: 通过对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甘州、肃州二地现存四种藏书记及其所附书目的解读,发现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学校图书传播事业总体比较滞后,而且逐渐趋于保守、科举化。而这种变化,又和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时代特点,以及国家统治思想息息相关。

关键词: 河西走廊;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科举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9)04-0192-04

中国图书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期以金石、竹简和绢帛作为书写载体的时代,只是贵族和士人阶层的活动。隋唐以来,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和纸张的大量使用,这种局面逐渐有所变化,图书出版开始转变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这种局面的变迁,到明清时代即告完成。据统计,明代的图书出版,仅官方记载的书目(重复不计)即达29000种,清朝更是超过此数。^①在图书出版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拥有庞大的职业出版群体和读者,并涌现出一批像毛晋、王世贞、钱谦益、黄丕烈这样的藏书家和学者。图书出版事业和文化生活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时期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勃兴。

就广袤的帝国国土而言,谈及明清时期的图书出版,论者往往仅就江南一隅而言。如果要全面了解明清图书出版以及教育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占有国土面积比例很高的边疆地区,其图书出版和教育的发展又是什么样子?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因为文献的缺乏和人们关注的不够,迄今对于明清边远地区的图书传播和教育事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笔者在翻阅河西走廊方志资料时,检出四篇记录明清时期该地区图书出版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文献——官方“藏书记”(贮书记)及其所附书目,恰巧可以弥补该地区图书出版和教育研究的不足,从而也可以对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事业和教育发展的地域偏差作一小小的补订。

一、明嘉靖《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

河西走廊南靠高峻雄伟的祁连山(又名南山),北有绵长古老的北山(包括合黎山、龙首山及其东延余脉)为天然屏障,中间夹有宽约5—50公里、海拔1000—1600米的狭长地带,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②汉武帝北击匈奴,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从此河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河西走廊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承担起汉唐盛世与西域联系的枢纽,尤其在唐代前期,其经济、文化达到了顶点,出现了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沙州(今敦煌)这样一些国际性大都会。^③《皇明杂录》记载:“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野翳,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尽管“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说法,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可以反映出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陇右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④在文化上,今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寺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以及武威天梯山石窟,都是这一

时期开凿。

但这种经济、文化兴盛的局面,随着唐朝以后丝绸之路的衰微而趋于萧条。从唐代后期吐蕃进据河西,迄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进军甘肃,河西地区久经战乱,政权更迭,文化发展处于一种比较滞后的状态。^⑤明朝建立后,陆续在全国设立了十三布政使司,加上南北二京,即所谓的“两京十三省”。在边疆地区,又有都司、行都司的军事机构。^⑥明代在河西走廊的军事建置,主要是陕西行都司,治所甘州(今张掖),其辖地与河西走廊大致相符。^⑦明代河西走廊现存方志主要纂修于万历时期,到清康熙年间又重新整理刊刻。其中,《重刊甘镇志》即为其较为重要的一种。《重刊甘镇志》纂成于明万历后期,在其《建置志·学校》中,收录了明巡抚都御史陈棐所撰的《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这篇重要文献。^⑧该文献是陈棐于嘉靖戊午年(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在巡抚甘肃都御史的任上所作,详细记录了河西走廊官方收藏图书的来源及现存状况,并附录了一份详细的图书目录。

明代陕西行都司下辖十二卫、三守御千户所,其主要职责是守卫河西走廊,防止蒙古的南侵(“隔断羌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有感于河西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所带来的弊病,在甘州(今张掖)设立了陕西行都司儒学,以教育武官子弟、培养地方人才。^⑨儒学设立后的效果如何呢?陈棐在嘉靖年间看到的情形是,儒学没有任何藏书,参加乡试的学生很多甚至没有见过除经书以外的其他文献,地方上能够处理日常公文往来的人很少。面对这种情况,陈棐遂动用官银,遣人前往陕西收购图书。图书除直接购买之外,还“摹印各府书版”。明代刻书风气很盛,各布政司衙门和大多数府、州、县都有刻书活动。陕西布政使司的刻书无论从种类和数量上,在明代各地区都居前列。《古今书刻》分地区著录了明代万历以前的图书种数,除了京师、南北直隶外,各布政使中陕西刻书(109种)仅居于江西(327种)和福建(112种)之后,远高于山西(41种)、云南(42种)等其他边疆地区。^⑩所以,行都司去陕西购买书籍,既节省路途,又可以购得较多的品种,这一点也可以从《贮书记》所附书目中看出。除了在陕西直接购买之外,《贮书记》中还提到另外一个图书来源,即“摹印各府书版”。前面已经提到,除了布政使司一级的地方机构大量刻书外,府、

州、县也往往从事刻书活动。陕西布政使司所辖各府，看来也进行过刻书活动，书版都有保存。陈棐派遣的购书人即用各府所藏书版，自费翻刻（摹印），《贮书记》所附书目中有不少陕西地方文献，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摹印”的。甚至连专门记载行都司的《陕西行都司志》，也从陕西购买。从而可以看出，至少在西北地区，明代不设州县的行都司本身并没有专门的刻书机构，似乎也没有进行过独立的刻书活动，所需图书都从邻近的布政司辖区购买或翻刻各府书版。《贮书记》所附书目，除去重复的，共 167 种。简单分类，列表如下：

表 1 《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35	21%
历史、地理	48	29%
诗文集	35	21%
医学、阴阳	22	13%
军事	7	4%
其他	20	12%
总计	167	100%

从上表的简单分类可以看出：一、图书的种类比较丰富。陕西行都司儒学所购买和印制的书，除了儒学通常必备的经学和理学类图书外，历史地理、诗文集等其他类别的图书所占比例也不小。看来，儒学的教育也并不拘泥于读经书，而是希望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同时，购买不少阴阳、医学等实用图书，说明行都司儒学的图书不仅供学生阅读，很可能也是一种类似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二、历史、地理类的图书所占比例最大。陕西行都司所辖的河西走廊地域，正当明朝国防前线，军事防守压力不小。^①陕西行都司儒学建立的目的，主要也是培养教育当地的武官子弟，希望他们能够文武兼治，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镇守边疆的重任。另外一方面，正德、嘉靖年间，明朝不但丧失了对哈密的控制面临吐鲁番的蚕食领土压力，而且河套蒙古横穿河西走廊腹地，进入青海游牧，直接击碎了明朝“隔断羌戎”的战略部署。陕西行都司儒学藏书中历史、地理类图书所占比例最大，是与这样一种历史境遇相一致的。三、图书的种类超过了《古今书刻》所记录陕西刻书 109 种，说明当时陕西图书市场是很繁荣的，除了自己刊刻图书外，还有不少图书品种来自其他地区。而陕西行都司所购买的图书，正是从这个庞大的图书市场采购而来。

除了各种图书所占比例值得注意外，还必须分析具体的图书。通过笔者粗略的检阅，发现除了上面谈到图书品种很丰富，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关于明代陕西的文献很多，如《陕西通志》《全陕政要》《雍大记》《陕西行都司志》等记录西北边疆的重要著作，都一一在列；此外，陕西名宦吕楠、康海等人的著作也很齐全。^②其中，嘉靖年间谪戍庄浪卫（今甘肃永登）并终老于该地的监察御史包节，所著《陕西行都司志》一书，专门记录河西走廊史事，^③竟然也是从陕西购买的。这更加证明了明朝陕西行都司下辖的河西走廊地域，并没有独立的印刷图书的机构。当然，既然是儒学学生，参加科举还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选要》等一类考试用书，也赫然在列。

购买这些图书并没有专项的经费预算，而是都御史从自己办公开支“纸牒银”中节省出来的。据同书《岁计志》记载，当时甘镇（包括甘州五卫、山丹卫、高台守御千户所）各衙门全年的办公经费“禀给柴烛银”，一共是 1860 两。^④《贮书记》只是说动用“本台纸牒银若干两”，从甘镇匮乏的财政状况判断，这里所谓的“若干两”大概就是一二百两的样子。正是这些数额并不大的经费，从陕西购买和“摹印”了 167 种图书，除去运费等额外支出，估计每种书的售价应当在一两银子以内，这也从一方面大致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图书价格水准。

从《贮书记》来看，明朝嘉靖以前，甘镇地区的图书传播和文化教育事业是很落后的。即使从陕西购买了 100 多种图书后，与甘州作为一个省级辖区都会的地位，也是不相称的。正是这种落后的图书传播状况，导致了明朝陕西行都司地区文化教育的极不发达。整个明朝，河西地区中进士的人不过五人而已。^⑤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明代河西走廊图书出版几乎是一片空白，所需图书基本都需要从邻近的陕西布政使司购买。其购买方式，包括出资印刷各府州县所藏的书版。这种图书出版和收藏的不发达，直接造就了河西走廊地区文化教育的不振。二、就陕西行都司儒学藏书本身来看，有种类丰富，注重当代和当地文献，以及历史、地理类图书比例最高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与其所处边疆地区的时代背景是相互印鉴的。

二、清乾隆《三学藏书表》、《陈洧川藏书目附记》

明朝灭亡后，迄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清朝在河西地区都沿袭了明朝陕西行都司的建置。雍正三年，清朝废除陕西行都司及所辖卫所，改隶甘肃布政使司（治兰州），甘州五卫更名甘州府。从明末到雍正年间，河西地区战火屡起，文化事业发展并不顺利。清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河西地区遭遇米刺印、丁国栋部暴动，尊经阁藏书毁于战火。顺治十三年，恢复陕西行都司儒学，以培养人才。而尊经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7 年），才由甘肃巡抚等衙门捐资兴建完成，“巨丽高敞，甲于河右，而藏书故阙如也。”^⑥此时清朝与准噶尔战争正酣，无暇顾及图书文化事业的兴办。

随着清朝在河西统治的稳固，尊经阁的图书逐渐恢复。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 1780 年）的《甘州府志》卷七《学校》，就保留了一份当时的藏书目录《三学藏书表》。^⑦所谓“三学”，是甘州府、张掖县、山丹县儒学的合称。从表文内容来看，尊经阁的图书并不是主动去采购得来的，而是主要来源于“郡邑所颁”，即朝廷所赐。《三学藏书表》共记录图书 53 种，其内容如下表：

表 2 《三学藏书表》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钦定、御纂图书	19	35.9%
十三经	13	24.5%
二十一史	21	39.6%
总计	53	100%

钦定、御纂图书 19 种分别是《谕旨录》《圣谕广训》《钦定书经》《钦定诗经》《钦定春秋》《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性理》《御纂朱子全书》《钦定礼记义疏》《钦定春秋之解》《钦定释义折中》《钦定周易述义》《钦定大清律》《钦定四书问》《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文初集》《御制诗初二集》《资治通鉴纲目三

编》《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从上表和钦定、御纂书目可以看出：一、图书品种单一、数量少。《三学藏书表》所列图书品种，与明嘉靖年间尊经阁藏书相比，显得非常单一。后者除了一些全国通行的官方文献外，有不少史地、军事、阴阳、天文、文集之类著作，而前者仅有钦定御纂等全国通行的文献。从数量上讲，乾隆时期的53种，也远逊于嘉靖时的167种。二、图书内容集中在官方教化方面，缺乏反映时代特色的文献。与嘉靖尊经阁书目相比，乾隆尊经阁书目完全是官方所颁图书，没有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地方文献。这种整齐划一的书目，也是清朝努力灌输官方思想的一种表现。

那么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显然，朝廷所颁发的图书与自由采购的图书之间，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明嘉靖尊经阁的藏书，是都御史陈棐派人去陕西采买所得，而乾隆尊经阁的藏书，却是朝廷颁赐。《三学藏书表》之外，府学还藏有乡贤陈史所捐赠的70余种图书，《甘州府志》的编纂者记录了该书目，即《陈洧川藏书目附记》。

陈史，字金鉴，甘州府张掖县人。康熙丙子科（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举人，任河南洧川令。他鉴于桑梓藏书稀少，不能启迪后学，遂在任上购书74种，运回故乡，任甘州学子任意取阅。乾隆年间，陈史之子将这些图书都捐给了书院。^⑩从《甘州府志》的记载来看，这两种官私书目尽管都是为甘州府儒学所有，但陈史的藏书还“以资阖郡肄习”，作用更广。而且贮藏的地点，是府学西面的火神庙，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当地居民查阅。今据《陈洧川藏书目附记》，著录的图书有84种，还有一些书因为书衣损毁，而没有录入。其种类略如下表：

表3 《陈洧川藏书目附记》书目分析^⑩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25	30%
历史、地理	27	32%
诗文集	18	21%
其他	14	17%
总计	84	100%

从图书种类来看，虽然没有明嘉靖尊经阁书目那样庞杂，但还是比较丰富的。构成图书主体的是经、史、集三类，其中史地类在全部图书中的比例超过了经学和理学类图书。并且地方文献比较丰富，如《甘肃通志》《肃州新志》《甘镇旧志》等；医学有《医宗金鉴》，律学有《瀛奎律髓》，农学有《农政全书》，可以看出陈史在购买图书时，充分考虑到了故乡的实际需要。

从甘州儒学明清两代现存的三种公私藏书目录，可以看出，清朝直到乾隆年间，无论从儒学的藏书品种上，还是数目上，都比不上明嘉靖年间的水准。200年间，甘州的图书事业进步不大，反而有倒退的趋势。但是，河西地域辽阔，仅仅是甘州一地就可以说明整个地区的状况吗？幸好，现存乾隆《肃州新志》也收有一篇藏书记。

三、清乾隆（肃州）《尊经阁藏书记》

肃州（今酒泉）在明朝为肃州卫，清为甘肃省直隶州。该地区方志，现存最早的是纂成于明万历晚期、重刊于清康熙年间的《肃镇华夷志》。^⑪该志偏重民族、边防，对文化教育记载比较简略，没有肃州地区图书收藏情况的记录。100余年后，肃州才

有了第二部方志，这就是由肃州分巡道甘肃布政司参政黄文炜于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纂成的《重修肃州新志》。^⑫在肃州第十三册，收录了黄文炜撰写的《尊经阁藏书记》，并附有一份藏书目录。^⑬在藏书记中，黄文炜记述了购买肃州尊经阁藏书的情况：

肃州学舍既成，复置阁于明伦堂之东，顾念来学者众，书籍鲜少，无以开拓其心胸，而增长其智识。时欲遣人远赴江南，以购求之。适学宪新承天子命来校是邦，鬻书者随至，因购得经、史、诸子，以迨制义、论策，共若干种，藏诸阁中。

黄氏的叙述，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当时购书的地是江南，而不是距离较近的兰州或西安。这已经与明嘉靖时陈棐派人去陕西购买大为不同，一方面江南是全国图书刊刻的中心，品种质量都超出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看出，清前期陕西地区的图书刊刻已经不能满足一般书院的需要。二、最终购买到的图书，来自跟随提学副使前来肃州销售书籍的书商。书商携带书籍前往各边远地区进行销售，在其他史料中并不多见。至少说明，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书商已经将其目光投向比较偏僻的边远地区，这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图书传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些书商是跟随提学副使前来肃州。提学副使管辖全省学政，每年定期出巡各府州，考核各地教育发展状况。各地为了应对学政的巡视，就必须充实本地的图书资料，方能显示对教育的重视。而书商们正是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们追随着学政的踪迹而行动，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学政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威，指定一些专门给儒学书院配置图书的书商。三、在所购书中，强调了“制义、论策”。所谓“制义、论策”，即科举考试的标准试卷和范文。随后在书目分析中，还要再谈到这个问题。《尊经阁藏书记》共记录了74种图书，其种类分布略如下表：

表4 《尊经阁藏书记》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20	27%
制义、论策	41	55%
其他	13	18%
总计	74	100%

这份书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浓郁的科举气息。制义、论策竟然占据了整个藏书的半壁江山（55%），剩下的主要是经学、理学（27%），其他图书比例很低（18%）。史地类的书更是少得可怜，只有《明史纪事本末》和《广舆记》两种。这与明嘉靖时史地类书籍占据重要地位的状况，相差甚远。而就在这41种科举用书中，又有许多不同，可以称得上是莘莘大观：有讲历年试题的，远的如《隆万大小题选》《天崇大小题选》等，近的如《国朝墨卷文订》《近科大题文宪》《本朝小题文宪》，因为清朝沿袭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所以明朝后期的考题在百年后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有各选家选定的范文集，如《汪选庆历读本》《陈大士稿选》等，最多的还是选名家的范文，如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的《归震川全稿》《归震川稿选》，唐顺之的《唐荆川稿》，名头最大的还是《王文恪公稿》，王文恪即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状元、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的王鏊；还有分析考卷内容的，如《考卷质疑集》《考卷商后集》《考卷裁伪集》。

真是无所不包,巨细无遗。从光绪时续修的《肃州新志》所记载的科举情况看,清朝乾隆以前100年间肃州共有4名举人,乾隆至光绪前不到150年时间内就有超过20人中举。^②从这个比例看,肃州藏书偏重科举是收到了实际成效的。而正是有了对科举的极端重视,商人们才会携带大量科举用书前往肃州销售,科举文献应当是当时图书销售中最畅销和利润最大的品种。

无论是乾隆甘州府藏书目录中钦定、御纂类图书的丰富,还是肃州儒学藏书中的科举文献的超重比例,都从某一种意义上反映出国家对地方意识形态控制趋于严格,并且科举考试文献逐渐成为儒学学生诵读学习的中心内容。

四、结论

通过对现存明清河西走廊方志中记录的四篇学校藏书目录(甘州三篇,肃州一篇)的对比,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作为省级地区的都会和地区重镇,明清时期甘州、肃州儒学藏书,种类和数量上都比较匮乏。其中数量最多的明朝嘉靖时期行都司儒学藏书,也仅有200多种,这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图书出版事业并不相称。其原因主要在于丝绸之路逐渐衰微,河西走廊距离内地遥远,文化信息很难到达,图书运输不便,以及官方图书经费的不足。

二、明朝嘉靖至清朝乾隆年间,河西走廊地区学校图书收藏总体趋势是趋向保守和科举化。从嘉靖年间史地类、应用类图书在藏书中的较高比例,到乾隆年间钦定图书、科举用书的泛滥,可以看出国家对地方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步加强,同时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渊藪,图书品种的多元结构被打破。

三、从四篇学校藏书目录的特点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从边疆向内地的逐渐转化。河西走廊在明朝处于国防的最前端,长期面临战争威胁。学校藏书特点是注重史地知识尤其是本地文献和实践类图书的收集,其目的在于培养文武兼具的实干型人才。而随着清朝逐步平定西北和疆域的扩张,河西走廊的边疆性质逐渐消失,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遂裁撤陕西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而代之以布政司和府州县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学校教育上,逐步强调对朝廷官方思想的接受,大量钦定、御纂图书的颁发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而学校教育的重心也完全转向“应试教育”,种类庞杂的科举用书占据了学校藏书的主流。

注 释:

①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② 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编著:《甘肃省地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5页。

③ 齐陈骏:《古代河西的兴衰》,载氏著《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第1—23页。

④ 唐代陇右道包括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描述陇右富庶的这段

话,因为被《资治通鉴》所引用,而广为人知。史念海的研究表明,其有夸张之处。史念海:《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载氏著《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11—300页。

⑤ 关于吐蕃进据河西各州的时间,参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017—1027页。

⑥ 明帝国的疆域,由行政系统的布政使一州县与军事系统的都司一卫所构成。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⑦ 明代陕西行都司的辖区,“东至临洮府兰县黄河,南至西宁卫黄河,西至肃州卫嘉峪关,北至亦集乃地”。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玄览堂丛书三集。与今河西走廊比起来,少了疏勒河流域,多出了西宁以及黑河下游等地区,主体部分是一致的。

⑧ 张志纯等点校:《重刊甘镇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1页。《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以下简称《贮书记》。

⑨ 当时的状况是,行都司平时的文件没有人能够撰写,武官子弟几乎都不识字。《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庚子条,台北中研院校勘本。

⑩ 周弘祖:《古今书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383页。

⑪ 河西之地“几二千里,惟一线通道,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虏”,其军事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万历《明会典》卷一三零,中华书局排印本1989年版,第670页。

⑫ 如吕楠的书,就有《泾野经说》、《泾野四书因问》、《泾野文集》和《泾野别集》四种。《重刊甘镇志》,第168页。

⑬ 此书已佚,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中华书局排印本1965年版,第643页。

⑭ 《重刊甘镇志》,第456页。

⑮ 明代河西走廊中进士的仅二人,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三人据《重刊甘镇志》。

⑯ 张志纯等点校:《甘州府志》卷三《国朝轶略》,卷十四《重建行都司儒学碑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第582—584页。

⑰ 《甘州府志》,第241—243页。

⑱ 《甘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第412页。

⑲ 《陈涓川藏书目附记》里面的十三经、十七史,都是按照一种计算,而本文参考此前两种书目的算法,依旧将十三经认为是十三种,十七史认为是十七种。所以,与《甘州府志》记载有不同。

⑳ 高启安点校:《肃镇华夷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㉑ 《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版。

㉒ 尊经阁为儒学藏书处的通称,“天下学校,莫不有尊经阁,广置经史,以备士子诵习。”《重修肃州新志》,第287—292页。

㉓ 吴生贵等:《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5页。

作者简介:马玉蕻(1973—),女,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编辑,研究方向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图书收藏。

责任编辑:志文;校对:晨曦